

# 明代《庄子》接受论

刘海涛 谢 谦

[摘要]《庄子》书,历代阐释者众多,蔚为壮观,今人名曰“庄学”。本文研究明代“庄学”,主要考察《庄子》书在明代的传播,大致分为三期:第一期,明初至中期,程朱理学独尊,《庄子》被视为异端,几无学者问津。第二期,正德嘉靖时期,王学勃兴,老庄重新引起读书人的兴趣,甚至将老庄语引入科举时文,评点《庄子》,以儒解《庄》,蔚成风气。第三期,晚明至明亡后,对《庄子》的接受,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,儒道互补,三教合一,最后则成为遗民的精神寄托。

[关键词]明代“庄学”;《庄子》;以儒解《庄》;以佛解《庄》

中图分类号: B223.5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4-3926(2009)11-0183-05

作者简介: 刘海涛(1972-),男,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;谢谦(1956-),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主要研究方向: 明清文学。四川 成都 610064

## 一、正德前对《庄子》的排斥

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,推尊程朱理学,“立教著政,因文见道,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。”<sup>[1]</sup>科举取士,以《四书》“五经”命题,以程、朱等理学家的阐释为标准。这一制度,造成儒林对程朱理学独尊的风气,如《明史·儒林传》说,明初诸儒,“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,师承有自,矩矱秩然。曹端、胡居仁笃践履、谨绳墨,守儒先之正传,无敢改错。”<sup>[2](P.722)</sup>把学术视野仅仅局限于宋代理学家的著述,“濂、洛、关、闽之书一日不可不读,周、程、张、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,舍此而他学则非矣。”<sup>[3](P.767)</sup>如此一来,诸儒对《庄子》一书,或弃之不顾,或虽有涉猎,亦多持批驳的态度。被称为明朝一代道统之开端的曹端,“学务躬行实践,而以静存为要”,其倡明绝学,对一切浮屠、巫覡、风水、时日之说均予以排斥。在《太极图说述解序》中,曹端曾批驳庄子对于“道”的理解:“孔子而后,论太极者皆似以气言。老子‘道生一,而后乃生二’,庄子师之,曰:‘道在太极之先。’曰‘一’,曰‘太极’,皆指作天地人三者,气形已具而浑沦未判之名。道为一之母,在太极之先,而不知道即太极,太极即道。”<sup>[4](P.15)</sup>“道在太极之先”,是庄子的观念,《庄子·大宗师》云:“夫道……神鬼神帝,生天生地,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。”而曹端认为“道即太极,太极即道”,而不认同“太极”之先还有一个“道”的存在,如庄子所说。曹端是以理来解释太极,“太极,理之别

名耳。天道之气,实理所为;理学之源,实天所出。”<sup>[4](P.14)</sup>而庄子却以气来解释太极,自无极而太极,当然成为曹端所批驳的对象了。

《明儒学案》首列的吴与弼亦劝人读儒家经典之书,其在《上严亲书》云:“所读书宜只以小学、《四书》为急,次及诸经本文,其子史杂书切未可轻读。男少有所得,浑在小学、《四书》《语略》《近思录》《言行录》。于此数书,苟无所深得,则他书易坏心术,其害非浅鲜也。”<sup>[6]</sup>黄宗羲论及吴与弼时说:“先生……身体力验,只在走趋语默之间,出作入息,刻刻不忘,久之自成片段。……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。学者依之,真可途辙可循。”<sup>[5](P.16)</sup>“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”正可见儒者的严谨及对老庄等排斥。吴与弼的弟子胡居仁更是恪守朱子,不踰尺寸。“其人品端谨,学问笃实,与河津薛瑄相类。”<sup>[7](P.1)</sup>胡居仁虽恪宗朱熹之学,却批评朱熹为道家之书作注,“谓朱子注《参同契》《阴符经》皆不作可也。”<sup>[2](P.723)</sup>胡居仁之所以批评朱熹注《参同契》《阴符经》在于他视佛、老之学为异端,“惟恐其或陷溺人心,变乱士习。”<sup>[7](P.2)</sup>其于庄子的“自然”、“无为”之论多有微辞,如胡居仁曾说道:“庄周所谓自然,非循乎理之自然,乃一切弃而不管,任其自然,所以旷荡不法,礼乐刑政皆无所用,反谓‘圣人不死,大盗不息’,欲‘剖斗折衡,使民不争。’”<sup>[7](P.65)</sup>在胡居仁看来,天理是最高的准则,是非的标准,人只有顺乎天理,“出于至诚之心,至实之理,行其所无事,

非有所勉强、私意造作”，这样才可称为“自然”、“无为”，而庄子的“弃灭礼法，付之自然，冲漠虚静”无疑是叛道之举，因此要“深辩详辟”。明初诸儒中，对《庄子》涉猎较多的是被称为北学的代表薛瑄，其于“子史百家，靡不淹贯”<sup>[8](P.35)</sup>。然而薛瑄作为大儒，其立身之处当然仍在儒家之学，“讲论经书，穷究义理，自一身一心推之至于万事万物，然后约之以归于一。……究竟至极，尤邃于性理之学。”<sup>[8](P.35)</sup>因此在薛瑄眼里，如薛瑄曾说：“庄子曰：‘诗以道志，书以道事，易以道阴阳，春秋以道名分。’先儒谓‘庄子是大秀才。’观此可见。”<sup>[3](P.662)</sup>此处先儒即是朱熹。但在薛瑄眼里，《庄子》毕竟是异端：“老子、庄子不述前圣之言，自为新奇之说，所以为异端也。”<sup>[3](P.767)</sup>

明初诸儒中，即或有赞庄子者，如被《明史》推为“一代文臣之首”的宋濂，也主要是欣赏其文辞：“其文辞汪洋凌厉，若乘日月，骑风云，下上星辰而莫测其所之，诚有未易及者。”<sup>[9](P.415)</sup>对其思想，则基本持否定态度：“然所见过高，虽圣帝经天纬地之大业，曾不满其一晒。盖仿佛所谓古之狂者。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，苟闻之，则其损过就中，岂在轲之下哉？呜呼！周不足语此也。”<sup>[9](P.415-416)</sup>甚至认为，《庄子》一书若流传于世，会危及国家的存亡：“不幸其书盛传，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，莫不指周以借口，遂至礼义陵迟，彝伦斲败，卒蹈人之家国，不亦悲夫！”<sup>[9](P.416)</sup>宋濂是道统的坚定维护者，认为“立言不能正民极、经国制、树彝伦、建大义者，皆不足谓之文也。”<sup>[9](P.269)</sup>按照这种观念，《庄子》之文，都在屏斥之列。

虽然，也有文人迷恋庄子，如贝琼叙樗隐先生，“终日杜门谢客，坐木榻，读《南华》内外篇”（贝琼《文集·樗隐先生传》），刘嵩自谓：“手把《南华经》闲来看《秋水》”（刘嵩《槎翁诗集·题延真陈炼师东庭四时词之三》），但这不过是边缘文人的闲情逸志，而非学术主流。《庄子》是学术界的冷门，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了正德、嘉靖时期。沈津在《百家类纂凡例总叙》里所叙求学经历，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：

津幼而失恃，盖颀然蒙也。先君子膝而授之经，颇了大义。比长，稍习艺文，暇则偷取百家书读之，若有契合者。先君子偶见之，恚曰：儿只取《六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读之足矣。独奈何泛览《庄》

《老》、《淮南》诸书，以乱心目乎？已乃徐海之曰：“学非博之难，而约为贵也。诸家书诚各有理，要在读之者裨精抉微，总之不诡于圣人，固六经之翊也。不然者，弊竭精神，犹为徒博，岂善读诸子者乎。津受命而退。”<sup>[12](P.296)</sup>

沈津嘉靖中官含山县教谕，所编辑的《百家类纂》刊印于隆庆元年。他早年因偷读诸子之书而遭其父斥责，这也是正德以前，《庄子》被社会排斥的一个缩影。

## 二、正德、嘉靖以儒解《庄》

正德、嘉靖时期，《庄子》的接受出现了转机，士林转变了此前对《庄子》的批判、冷落的态度，开始重新评定《庄子》接受《庄子》。随着王学的兴起，程朱理学受到挑战，学术风气也逐渐发生变化，“盖自弘治、正德之际，天下之士厌常喜新，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，而文成以绝世之资，倡其新说，鼓动海内。”<sup>[13](P.1421)</sup>文成，即指王守仁。其实，明代的学术风气，从陈献章就开始了新变，“学术之分，则自陈献章、王守仁始。”<sup>[2](P.7222)</sup>陈献章的心学，受老庄影响颇深。王守仁早年也出入释老，其思想也深受庄子的影响。正是由于学术的转变，给明代《庄子》的接受带来了转机。正、嘉时期注《庄子》之作虽然数量有限，但毕竟一改此前的冷落局面。除严灵峰《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》所著录的数种之外，尚有多次重刻的宋林希逸的《三子口义》。而明正德十三年戊寅（1518）贾咏铜活字印本的《庄子虞斋口义》十卷附《释音》一卷<sup>②</sup>，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明刊本《庄子》注书。

正德、嘉靖时期对《庄子》的接受，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前人成果到独立阐释的过程。依附前人的成果，即内容上多承袭前人，如高允叔的《郭子翼庄》一书即摘录郭象的注而成。高允叔认为“晋郭象注《庄子》人言《庄子》注郭象，妙处果然。……其言真足羽翼庄氏而独行天地间。”<sup>[14](P.1)</sup>所以“择其元之又元者，为八十一章。”<sup>[14](P.1)</sup>方鹏的《庄子摘抄》（在《六子摘抄》内）虽然现已亡佚，但从其题为“摘抄”来看，亦应是摘录汇集而成的著述。杨慎的《庄子阙误》焦竑编在《升庵外集》与《道藏》本及焦竑的《庄子翼》所附录的题为陈景元撰的《阙误》相对校，只多音注一部分，其余皆相同。明人独立阐释《庄子》之作，始于随手所作札记，如杨慎的《庄子解》，说明嘉靖初期《庄子》已经引起士大夫的注意，已经进入了他们的阅读范围。从杨慎的《庄子解》来看，他不再简单地将

《庄子》视为异端,而是试图将庄子纳入儒门,打通儒道,如认为“庄子语暗合中庸”<sup>[15](P.23)</sup>，“庄生之言亦孔门家法也”<sup>[15](P.7)</sup>。嘉靖后期,则出现了明人全面阐释《庄子》的注书。目前所见明人第一部《庄子》注书,就是刻印于嘉靖三十九年庚申(1560)的朱得之的《庄子通义》。基于三教同道的观念,朱得之认为《庄子》之书与儒家《诗》《书》是“其异者,辞也;不异者,道也”<sup>[16](P.181)</sup>也。同样将《庄子》纳入儒门。朱得之《庄子通义》附录了宋褚伯秀的《义海纂微》“先是宋咸淳间钱塘道士褚伯秀尝作《义海纂微》,未行于世,王潼录其遗稿以授得之,得之因附刻于每段之下,先列《通义》次及《义海》。”<sup>[17](P.1256)</sup>朱得之这种先列《通义》后附宋人《义海》的做法,也表明明人已摆脱前人的窠臼,以自己之见来批注《庄子》。朱得之《庄子通义》非常关注《庄子》一书的词章,朱得之曾说:“修词立其诚,学问之全功也。褚氏以前诸解多主立诚。今《通义》略兼修词者,盖欲习词章者,知反于性道,理学性者,知谨于词气。庶乎先哲启后之心,而后世爱而传之之物也。”<sup>[16](P.184)</sup>虽然南宋林希逸、刘辰翁等人曾“以文论《庄》”,但将“修词立其诚”推举到“学问之全功”的地位上,这在《庄子》接受史上是未曾有过的。而且此时明人更是突显了《庄子》词章之“奇”。如杨慎说:“昔人谓郭象注《庄子》,乃《庄子》注郭象耳。盖其襟怀笔力略不相下。今观其注,时出俊语,与郑玄之注《檀弓》亦同而异也。洪容斋尝录《檀弓注》之奇者于随笔,予爱郭注之奇亦复录于此。”<sup>[15](P.4)</sup>评论《庄子》文法、章法、句法以及用字之奇,是明嘉靖直至明末对《庄子》接受的一个最大的特色,而这也是与明中期学风的转变密切相关的。

### 三、隆庆至崇祯对《庄子》多样性地接受

正、嘉时期,《庄子》虽已被正面接受,但也只是为少数士大夫所关注,注书的数量也有限。而隆庆至崇祯末年,《庄子》则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,上至权相重臣、内阁学士,下至县令、教谕,道士、僧人、居士、隐士、书坊商贾,各色人等,讲论、品评,解《庄》注《庄》,一共留下了二百余种著书,这也形成了明代庄学史上长达数十年的兴盛局面。隆庆至崇祯末《庄子》的接受是顺着正、嘉时所开创收的两条道路行进的,一是“以文解《庄》”,即剖析《庄子》句法、章法、文法的特征,突显《庄子》之“奇”,这是为科举服务的《庄子》品评,而这“尚奇”的倾向也使明代庄学走上了搜奇

猎艳的歧途,我们只能认定其为虚假的繁荣。另一途则是对此种学风的反思,并在这种反思中,开辟出另一条接受《庄子》的道路,那就是回归到义理阐释的道路上来,而这形成了明代庄学真正的兴盛。

《庄子》品评中逐渐形成的搜奇猎艳之风,实起自后七子的李攀龙、王世贞等人。潘之恒在为臞鹤悦公的《道德颂》所作的序言中曾说:“嘉、万间,三大师比间长干,而老庄盛行于世。先是历下、娄东、淇中诸公,皆以著作显竟,搜奇猎艳于漆园,而三大师独标名理,所称雪浪恩公、臞鹤悦公、湛怀义公。”<sup>[18]</sup>历下、娄东、淇中诸公即是李攀龙、王世贞、汪道昆等人。潘之恒的这句话表明明代庄学真正的兴盛,首先得力于丛林内的僧众们对《庄子》义理的阐发。雪浪洪恩等人的《庄子》著述现在已无从寻觅,但据严灵峰《侗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》中记载,晚明僧人注《庄》著述还有释性通的《南华发覆》释如愚的《庄子旦暮解》释通润的《漆园逸响》释正海的《庄子注释》以及憨山德清的《庄子内篇解》。同时与这些高僧交往密切的居士也有大量的《庄子》著述,诸如焦竑的《庄子翼》李贽的《庄子内篇解》陶望龄的《庄子解》袁宏道的《广庄》袁中道的《得庄》杨起元的《南华经品节》等等,僧众与居士们多以佛解《庄》甚至佛化庄子。正是由于佛教对整个晚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,晚明注《庄》多参杂佛理,即使道士陆西星的《南华真经副墨》也多以佛入庄。当然佛门内也有标新立异之作,释性通虽身为僧人,但其并不认同憨山德清等人的以佛化庄,其《南华发覆》则以《庄》解《庄》,成为丛林的异响。

隆庆以后,除上述以佛解《庄》之作外,士大夫亦有以儒解《庄》者,如沈一贯的《庄子通》叶秉敬的《庄子膏肓》等。沈一贯在《庄子通序》中说:“庄子本渊源孔氏之门,而洸洋自恣于方外者流……余以其五万六千集余参而五之,以畅其说,虽不中庸,远乎哉?”<sup>[19](P.2)</sup>而陈以宁蹶于科场而游于方外,以性命之学注疏《道德》《南华》。邹忠允在《南华真经注疏序》中述其以丹经参破《庄子》之路时云:“数载以来,复圭时潜心《南华》癸酉秦春,顿悟其为丹经之祖,鲲鱼即丹经之水虎,鹏鸟即丹经之火龙。二语参破,一部《南华》莫不迎刃而解矣。”<sup>[20](P.1)</sup>程以宁在《南华真经注疏传神集后序》中也自云:“夫‘南’者,火也;‘华’亦火之精神也。此南华在天为太阴晦壬朔癸之火

候,在人为真经前期后之火候。庄老题为‘南华真经’者,所以点破流戾,就已取坎填离之妙窍耳!非得天仙之口诀者,安能知之。”<sup>[20] (P. 773)</sup>除了大量以各种理路自解《庄子》的著述外,此期更是出现了大量的集释、荟解之作。如郭良翰的《南华经荟解》潘基庆的《南华经集解》焦竑的《庄子翼》<sup>[21] (P. 26)</sup>等等。这些本子辑各家之说,保留了大量的前人论《庄》之作,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同样是集释、荟解之作,其中亦是良莠不齐,较优者,如郭良翰的《南华经荟解》,辑《庄子注》二十家,又附有诸家音义,荟集百家之精华,如郭良翰自己所云:“诸家各有玄解,羽翼《南华》,葺孤腋荟为千金,碎琼枝皆成寸宝矣。”<sup>[21] (P. 26)</sup>而粗劣者,由于选者本人的学力不足,往往只是杂采诸家之论,而无法将其义理融为一体。

随着晚明庄学的日益兴盛,明人开始自觉地全面品评历代庄学,出现了具有“庄学史”性质的著述。品评前代庄学,虽古已有之,但陈治安刊于崇祯五年的《南华真经本义》附录卷二至卷八,汇集了历代评庄言论,又加以己评,上至战国,经西汉、东汉、三国、晋、南北朝、唐、南唐、五代、宋、南宋、辽、金、元,直至皇朝(明朝),堪称中国第一部庄学史著作。

#### 四、明遗民对《庄子》的接受

明王朝在经历天崩地裂的巨变后,于崇祯十七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。然而思想史的变化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骤然转轨。明人对《庄子》的接受也并没有明朝的灭亡而戛然而止,反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,《庄子》成为乱世中明遗民思想的寄托。大批遗民怀着故国之思,将《庄子》视为哀世之书,或闭门著述,不问世事;或奔走行事,以图恢复。如着有《庄子释》的董汝煌,《乌程县志》本传称“喜施予,家虽落,犹好义不衰。汝煌县学生。甲申后闭户著书。”<sup>[22] 《歙县志·汪益亨传》</sup>称汪益亨:“少负才名,与汪扶光、江文石、江联季友善,甲申后诸人各成其志,益亨南走闽粤,归老金陵,号钟山逋客。手录书径尺,着有《南华注》诗文各种。”<sup>[23]</sup>虽然此时的《庄子》著述多已亡佚,但从觉浪道盛的《庄子提正》方以智的《药地炮庄》钱澄之的《庄屈合诂》屈大均的《读庄子》佘亭静挺的《漆园指通》王夫子的《庄子解》以及方以智《药地炮庄》中所保存的诸人的作品,如凌沧虚的、薛正平、陈丹衷、曹心易、王宣、金堡、萧士玮、方孔照等人的《庄子解》吴观我的《庄子正

语》佚名的《庄子弋说》闲翁的《庄子漫衍》萧伯升的《庄子漫衍较》等等,我们还是可以一窥明遗民通过论《庄》所展示的心路历程。

遗民论《庄》“庄子定位论”是其中一个中心议题<sup>④</sup>。其中觉浪道盛的“托孤说”、方以智、钱澄之的“《庄》《易》合论”、屈大均等人的“庄屈合一论”、佘亭静挺的“释家别传说”、王夫之的“自立一宗说”是最有代表性有观点。此时众遗民之所以均以“庄子定位”为论题,在于身处异代衰世的遗民们与庄子求得了人格上的认同;而论题各不相同,又在于遗民是“各遇其所遇”,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方以智的《药地炮庄》时云“是编乃所作庄子解,……以庄子之说为药,而以解为药之炮,故曰《炮庄》。大旨诂以佛理,借混洋恣肆之谈以自摭其意,盖有托而言。非《庄子》当如是解,亦非以智所见真谓《庄子》当如是解也。”<sup>[17] (P. 1256)</sup>方以智所托,即是借论《庄》聊慰遗民之心愿了。因此,这些论题展现了明遗民的气节与学术精神,而遗民论《庄》也使得明末清初的庄学笼罩在特有的悲愤色彩之中。

明代《庄子》的接受是《庄子》接受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,然而又是一个不为学界所重视的阶段。透过明代那些数量繁多,但质量良莠不齐的《庄子》著述,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明代《庄子》接受的阶段性及其特征,可以辨析出到明代庄学的兴盛与虚假的繁荣,更可以感悟到明人倾注在《庄子》著述中的那份独特的生命体验。而这些对我们全面地了解明代《庄子》的接受应该是有所裨益的。

#### 注释:

①严灵峰先生认为张位的《南华标略》一书,成书年代是“公元至一五三八年”。(严灵峰,《侗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3年,122页。)汤显祖《玉茗堂全集》卷一《张洪阳公七十寿序(代)》中称:“今上御历之三十一春王正月之元旬,是为洪张老先生诞辰也。”(存集 181—6页)“今上御历之三十一”,应是万历三十一年,此年张位七十岁,可此可推知张位生年为 1525 年,而严灵峰先生认为其《南华标略》成书“至公元 1538 年”,此时张位仅十三岁。因此严灵峰先生的推断值得怀疑。据张位科第及服官来考察,此书大多在万历年间或万历后完成。

②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《三子虞斋口义》十四卷云:“后有正德戊寅南京国子监司业弋阳汪伟跋,言临祭酒贾公藏善偶诸生胡曼有活字印,因命摹之,以代抄写云云。”按:据此,知三子口义正德时有胡曼活字本,印行者为贾祭酒。顾活字本生平不特未见,亦所未闻,目录记载均不之及,故着于此,以待访求。沅叔。”(傅增湘撰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第三册子部 894 页,北京:中华书局,1964—1967)字鸣和,号南均,河南临颖人。此本即

为其待访之书。

③可参见刘海涛《丛林论〈庄〉与明代学风》一文,见《海南大学学报》,2008年第3期。

④可参见谢明阳《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》一书,台北:台湾大学出版社委员会,2001年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何乔远.名山藏[A]/四库禁毁书丛刊(史部48册)[M].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00.5.
- [2][清]张廷玉等撰.明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7222.
- [3][明]薛瑄.读书续录[A]/文渊阁四库全书(711册)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:767.
- [4][明]曹端撰.清张伯行辑《曹月川集》[A]/文渊阁四库全书(1243册)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.
- [5][清]黄宗羲著,沈芝盈点校.明儒学案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6][明]吴与弼.康斋集[A]/文渊阁四库全书(1251册)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:521.
- [7][明]胡居仁.业居录[A]/文渊阁四库全书(714册)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.
- [8][明]薛瑄.敬轩文集[A]/文渊阁四库全书(1243册)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.
- [9][明]宋濂.文宪集[A]/文渊阁四库全书(1223册)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.
- [10][明]林堯俞等纂修,俞汝楫等编撰.礼部志稿[A]/文渊阁四库全书(597册)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.
- [11][明]胡广等奉敕撰.性理大全书[A]/文渊阁四库全

书(711册)[M]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.

- [12][明]沈津辑.百家类纂[A]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(子部127册)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5.
- [13][清]顾炎武著,黄汝成集释.日知录集释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.
- [14][明]高允叔.郭子翼庄[A]/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(11册)[M].台北:艺文印书馆,1972.
- [15][明]杨慎.庄子解[A]/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(3册)[M].台北:艺文印书馆,1974.
- [16][明]朱得之.庄子通义[A]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(子部256册)[M].济南:齐鲁书社,1995.
- [17][清]永瑢等撰.四库全书总目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18][明]僧悦.尧山藏草[A]/禅门逸书初编(第7册)[M].台北:明文书局,1980.16.
- [19][明]沈一贯.庄子通[A]/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(9册)[M].台北:艺文印书馆,1974.
- [20][明]程以宁.南华真经注疏[A]/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(28册)[M].台北:艺文印书馆,1974.
- [21][明]郭良翰.南华经荟解[A]/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(13册)[M].台北:艺文印书馆,1972.
- [22][清]潘玉璇修,清周学浚纂.乌程县志[Z].清光绪五年(1879)刻本,卷十六,1页.
- [23]石国柱修,许承尧纂.歙县志[Z].1937年铅印本,卷十《人物志·遗佚》:4.

收稿日期:2009-08-12 责任编辑 陈灿平